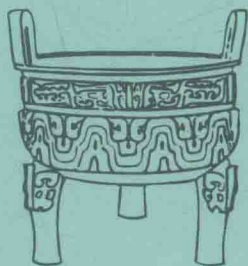


诸子现代版丛书

方勇 主编

说苑

程翔
评注



诸子现代版丛书

方勇 主编

说苑

程翔 评注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8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说苑/程翔评注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18

(诸子现代版丛书)

ISBN 978-7-100-15409-3

I. ①说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笔记—中国—西汉
时代 IV. ①K234.10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43708 号

权利保留,侵权必究。

诸子现代版丛书

说苑

程翔 评注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-7-100-15409-3

2018年3月第1版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201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32

定价:106.00元

诸子现代版丛书

学术顾问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李学勤 陈鼓应 陆永品

钟肇鹏 卿希泰 傅璇琮

主 编 方 勇

策 划 厚艳芬

总 序

方 勇

春秋战国之际,王道衰微,诸侯异政,礼乐崩坏,事不稽古。其间诸子,究际天人,异说郁起。老庄述道,孔孟言礼,墨翟执俭,申韩持法,其余诸家,亦各申己见,激辩争鸣。承流而枝附者,不可胜计,诸子之学,勃然而兴,诚为中华文明之活水源头。

自汉武改运,百家罢黜,儒术独尊,然子学一脉,承传绵延,代有兴发,不绝如缕。清末民初,旧政易制,西学东渐,儒学独尊地位不再。章太炎、梁启超、钱穆、吕思勉、冯友兰、于省吾、严灵峰诸君,各奋勤智,推究诸子,彰明百家,子学重现繁荣之貌。方今之世,政通人和,文运昭回。学界同仁,秉承诸子精神,整理诸子文献,述道言治,持说论辩,子学全面复兴之势,不可遏抑。

子学之全面复兴,其要有四:一曰整理文献;二曰精研学术;三曰传承精神;四曰推广文化。四要之中,整理文献奠其根基,精研学术掌其主干,传承精神运其枢纽,推广文化辅其侧翼。夫四要者,方今学者所推重者也。学界群贤,或专治一要,或数要并攻,各逞高论,共襄复兴之盛事。《诸子集成》《无求备斋诸子集成》《子藏》等子学文献整理丛书相继刊行,子学文献之整理愈发扎实厚重。《诸子学刊》《管子学刊》《老子学刊》《孔子学刊》《诸子研究丛书》等子学研究丛刊、丛书亦渐次问世,持续推动子学研究向纵深

发展。合而观之,当代子学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,均有长足进步。然子学精神之提炼传承、子学文化之普及推广尚显薄弱。子学精神者,曰人格独立、精神自由,学派之间平等对话、互相争鸣,直面现实以深究学理,不尚一统而贵多元共生之精神也。子学精神贯穿历代子学发展之始终,实为诸子学说流衍之内在动力,乃子学承传延续之真脉。新时代之子学,当以承传发扬子学精神为己任,推陈出新,彰显当代子学之风标。再言子学文化之推广:诸子持论迥异,流派分明,各有传授,加之世事时局之影响,虽源远流长,却多持于士大夫、文人学者之手,并未在民间广为流传。然则诸子之学,本非束之高阁、囿于书斋之案头学术,而实为导世化俗、作用当下之实学。子学研究若清谈理论,不能化为时用,纵汪洋恣肆,亦难免于空疏之责。是故当代之诸子学术,务期以昌明国法,启蒙民智,摧邪辅正,去伪存真。故曰推广子学文化为子学复兴之辅翼,不可或缺。唯有深度与广度之二维拓展,方可引领子学之全面繁荣。

方今时代,与先秦相类,文化多元,议论蜂起,传统与革新同在,危机与机遇并存。固守传统、推尊一家,已难以独擅学林。传统文化、学术之转型,势在必行。由是,根植传统文化沃土而离脱旧学窠臼、融通中西思想方法而延续民族真脉之“新子学”应运而生。“新子学”之时代任务有三:一曰提炼并弘扬子学精神。以子学精神为导引,方可重拾独立、自由、平等、共生之优良传统,进而消解旧学专制、偏激、排异之流弊,从而锻造当代多元、会通之学术、文化。二曰重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。“五四”之际,旧学统治崩坍,除旧立新之声四起,加之西学涌入推助波澜,新文化运动席卷

中华大地,是故中国传统学术承传递嬗之脉络暂告中断。学界多依傍西学体系,以期重构中华学术。《诗》归文,《春秋》入史,《论》《孟》归哲。就其形式而言,可谓大致实现传统到现代之转型。得益于此,中华学术亦得以挣脱桎梏,获得长足之进步。然就其实质而论,中学之血脉未能全合西学之骨络,使现今学术,表里不一,精神尽失,不能与西学平等对话,于世界范围几近失语。揆诸当今形势,中华文化之复兴,既要植根于传统,又须着眼于世界。其话语体系之重构,迫在眉睫。诸子之学,凝聚先人智慧哲思,为中华文化学术之源头,民族话语系统之柱石。“新子学”脱胎于传统子学,兼有融通中西之思想、契合当前再造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之要求,当成为革新学术、重塑精神之中坚。三曰全面复兴子学,引领当代之国学。先秦之际,百家之说虽隐显各异,实则无高下之判。汉武推孔氏,黜百家,遂有经子之分野。传统国学,以经学为主导,因循守旧,排斥异端,以致抱残守缺,丧失创造革新之能力。“新子学”力主退经还子,全面复兴诸家之学,由此构建兼容经儒、并包诸子之开放体系,缔造包罗万有、生生不息之崭新学术,引领当代国学之发展走向。近两年间,学界先后数次召开高端学术研讨会,问脉“新子学”,有关“新子学”之议论亦持续升温。讨论日趋深入,“新子学”亦渐入人心,其理念、体系、方向已获学界多数朋友认同。“新子学”已崛起为当代主流学术之一。革新传统子学,缔造全新学术亦由此成为当前子学发展之风向标。恰值此时,商务印书馆欲刊行《诸子现代版丛书》,此举无疑顺应时代之要求,符合子学发展之规律,与“新子学”之理念不谋而合,实为复兴诸子之学、弘扬百家文化之新鲜血液。

20世纪以来,子学著作之整理成果颇丰。《诸子集成》《新编诸子集成》《诸子集成续编》《诸子集成补编》《无求备斋诸子集成》等大型丛书先后推出。《子藏》前两批成果之面世将子书整理推上另一高峰。《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》亦选入部分子书,另有某子之注译、选译单行本等等。就当前成果而言,《子藏》等大型丛书固然体系宏阔、内容丰赡,然其以整理元典为要,以保留子书原貌为先,文献价值虽高,却因语言古奥不利于大众之接受。今人之注译、选译,化繁为简,变古为今,易传播于当今,然各成一家,不成体系,标准不一,良莠不齐,恐有泥沙俱下、以讹传讹之虞。由是看来,《诸子现代版丛书》之出版,顺时应势,甚为必要。该丛书精选诸子百家之善本,全面注译原文。子书以刘勰所谓“诸子者,入道见志之书也”为标准择选,即诸子为诸子百家之子,而非经史子集之子。诸子之涵盖范围循章炳麟《诸子略说》之言,即“所谓诸子学者,非专限于周秦,后代诸家,亦得列入,而必以周秦为主”。另,篇首设题解,篇尾设评析,前后呼应,解读通篇大意,论析主要观点,导引读者接受。丛书全注全译,博采众长,简明晓畅,务求变古奥为浅近,化艰深为平易。题解、评析学术性与可读性并重,力争符合史实,通达精到。《诸子现代版丛书》之编成,文献价值与可推广性兼而有之,对当代子学之复兴与繁荣必有强劲之推动作用。

《诸子现代版丛书》之编撰宗旨为弘扬华夏传统文化,振兴中华民族精神。该丛书就文献价值而言,择选版本精善,体系构建谨严,持论平允适当,与《子藏》等诸子丛书相类,当成传世之经典。就其学术价值而言,立足于经典传承,着眼于文化普及,揭百家之面纱于众生,显诸子之精神于当世,使诸子当下之学之本质得以回

归,大利于子学之普及与推广,无疑契合子学全面复兴之要义。就其现实意义而论,创新学术,彰显时代之风标,有益于大众对民族文化之认同,亦有益于提升华夏文明之世界影响与地位,从而助力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之重构。《诸子现代版丛书》之面世,得益于学界整理诸子文献,创新百家学术之长期积淀,《诸子集成》系列丛书、《子藏》《诸子研究丛书》、“新子学”等均为其提供了丰富滋养。《诸子现代版丛书》之成书,亦是子学转型发展之必然,从传统到现代,自精英及大众,由封闭而融通,预示着当今子学发展已步入“新子学”阶段,子学之全面复兴,势在必然。

一人之立,尚需精神;一国之立,何能无精神而自行?耽于功利,惑于途说,大言炎炎,小言詹詹,所谓中国者竟何谓乎?诸子百家之学,源远流长,承传绵延两千余年而不减其泽,实为中华文化与精神之活水源头。当今中国之崛起,民族之复兴,实应以精神之回归、文化之传承为保证。归根返本,正本清源,正待其时。当代诸子之学,当汇纳百家以成不朽,淘沙取金以锻精神,引领文化、学术之走向,助推民族、文化复兴之实现。《诸子现代版丛书》为当代诸子学之力作,必将于未来之学术与文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,成就一代之经典。

2014年9月15日

导 言

一、刘向其人

刘向(前 79—前 8)^①, 西汉经学家、目录学家、文学家。原名更生, 字子政, 沛(今属江苏沛县)人。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。其祖父刘辟强, 有清望, 为武帝所重, 任过宗正。其父刘德, 曾召见甘泉宫, 被武帝誉为“千里驹”^②, 也做过宗正。刘向身为皇室宗亲, 从小受到良好教育, 12 岁荫任辇郎。成年后(前 60), 刘向“以行修饬, 擢为谏大夫”。又因通达能属文辞, 献赋颂, 展露才华, 被宣帝选为名儒俊材, 常侍左右, 待诏金马门, 并开始接触皇家图书, 为后来学术生涯奠定基础。

公元前 51 年, 汉廷召开石渠阁会议, 宣帝“诏诸儒讲《五经》同异……立《谷梁春秋》博士”^③。又诏命刘向传授《谷梁春秋》, 从此“谷梁之学”大盛。这是刘向学术生涯的发展时期。后拜为郎中, 给事黄门, 迁散骑、谏大夫给事中。

① 刘向生卒年有四说。本书采用钱大昕之说。钱穆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与徐兴无《刘向评传·刘向生卒年考异》均持此说。

② 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。

③ 《汉书·宣帝本纪》。

公元前48年，刘奭即位，即汉元帝。当时辅政大臣萧望之与宦官弘恭、石显形成两大势力。弘恭、石显在宣帝时就任中书令，“久典枢机，明习文法”，又与车骑将军史高等结为一体，常常在朝廷上与萧望之作对。萧望之认为重用宦官非国家旧制，也违背古人不近刑余之人的规定，当革除宦官专制的弊制，以士人代替宦官所任要职。这就与弘恭、石显等人发生了极大的矛盾，虽经多次较量，但皆遭失败。公元前47年，萧望之下狱后饮鸩自杀。后刘向被视为萧的朋党免为庶人，弃置十余年。

公元前32年，刘骜即位，即汉成帝，石显因罪死亡，刘向复出，拜为中郎，使领护三辅都水，迁光禄大夫。于是他更名为“向”，表达了对皇帝的无限希望之情。然而这时把持朝纲的外戚王凤对刘向这样的皇族心存戒备，阻挠其进入权力中枢。河平三年（前26），54岁的刘向受命主持中国文化史上一项浩大工程——以光禄大夫身份主持校理皇家图书，即中秘书，其子刘歆担任助手。57岁时，刘向又任中垒校尉。

我国《诗》《书》遭遇秦火之后，民间藏书大为减少。项羽烧秦宫，官府所藏荡为灰烬。汉代之初，萧何重视文化典籍的保护工作，主持修建了三座皇家藏书楼，名为石渠阁、天禄阁、麒麟阁。武帝时又建立国家（外廷）和皇家（内廷）图书馆，诏令天下献书。从汉武帝元朔五年下诏令礼官劝学，到汉成帝河平三年，整整一百年，书积如丘山，但未经整理，不能发挥作用。因此，刘向奉诏承担的这项文化整理工作，具有格外深远的意义。刘向不间断地工作了19年，卒于任上，为后人留下了中国目录学的开山之作《别录》。刘歆继承父业，撰写《七略》。尽管两书已佚，但我们从《汉书·艺

文志》中可知其概貌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,刘向校理经传、诸子、诗赋,“每一书已,向辄条其篇目,撮其旨意,录而奏之”。刘向所见之书,大概来自四个方面:1. 宫廷藏书;2. 太史书;3. 太常书;4. 私人藏书。刘向比对不同版本,着力校勘,校讎讹文脱简,校讎学由此诞生。因此,刘向是中国校讎学的开创者。严可均编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,收录刘向所写的“叙录”(“书录”)10篇,它们是:《战国策书录》《管子书录》《晏子叙录》《孙卿书录》《韩非子书录》《列子书录》《邓析书录》《关尹子书录》《子华子书录》和《说苑叙录》。另外还有大量“叙录”没有流传下来,比如《楚辞》是刘向编辑并定名,是我国最早的文学别集,但该书“叙录”已不传。这些工作奠定了刘向在中国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地位,班固在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中这样评价:

自孔子之后,缀文之士众矣,唯孟轲、孙况、董仲舒、司马迁、刘向、扬雄。此数公者,皆博物洽闻,通达古今,其言有补于世,《传》曰:“圣人不出,其间必有命世者焉。”岂近是乎?

章太炎在《国故论衡·明解故》中还说:

刘向父子总治《七略》,入者出之,出者入之,穷其原始,极其短长,此即与正考父、孔子何异?

余嘉锡在《古书通例·叙刘向之校讎编次》中说:

使后人得见周、秦诸子学说之全者,向之力也。

刘向一生热衷政治,但最终与权力中心失之交臂。这既是刘向的遗憾,也是刘向的幸运。正是因为有了主持校理皇家图书的任命,才有了永垂青史的刘向,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!

刘向本人著作有《尚书洪范五行传论十一卷》(残存)、《五经通

义九卷》(残存)、《五经要义五卷》(残存)、《别录二十卷》(残存)、《列女传八卷》(存)、《新序三十卷》(存十卷)、《说苑二十卷》(存)、《刘向赋三十三篇》(今残存《九叹》等数篇)、《刘向说老子四篇》(亡)等。还有奏议十一篇,可惜多数已亡佚,虽有严可均、陈寿祺等人的辑佚,但终归失多存寡,难见全貌。明代张溥辑有《刘中垒集》,收入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中。当代整理本有《两汉全书》(第九册)收录最全,邓骏捷整理,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。

刘向身为皇族成员,积极维护刘氏江山是其义不容辞的职责。反对宦官乱政,力排外戚势力,对上忠谏直言,贯穿刘向一生;虽然屡遭贬黜,备受打击,然初衷不改,其忠君报国之心可谓诚矣!刘向思想体系中,天人感应、灾异映世思想十分突出。他多次上书,借天灾言人祸,劝皇上谨守君道,戒奢倡俭。儒家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,颂圣君,歌贤臣,近贤远佞,保民安邦,致天下太平昌盛,是其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标。同时,其思想中又掺杂道家、法家、墨家等学派因素,呈现出比较宽宏包容的一面。总之,《说苑》一书比较集中地展示了他的思想体系。

二、《说苑》其书

《说苑》是刘向主持校理皇家图书期间编撰成的一部书,最初书名为《新苑》,《汉书·艺文志》始称《说苑》,后世遂沿称至今。据刘向《说苑叙录》记载,当时,中秘书中有一部书名为《说苑杂事》,刘向认为它“事类众多,章句相溷,或上下谬乱,难分别次序”。于

是“除去与《新序》复重者,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,别集以为《百家》。后令以类相从,一一条别篇目,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,凡二十篇,七百八十四章,号曰《新苑》,皆可观”。由此得知,今本《说苑》有底本为据,即《说苑杂事》。那么,《说苑杂事》是一部什么书呢?因缺乏足够文献资料证明,目前尚无法下断语。台湾学者左松超在《论〈儒家者言〉及其与〈说苑〉的关系》(见《说苑集证》附录)一文中,根据河北定县八角廊四十号汉墓出土竹简进行推断,认为《说苑杂事》当时并未成书,只是一批资料。这批资料是“儒家者言”的一部分。当然,这只是推断而已,因为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《儒家言》一书,十八篇,归入“儒家”。“儒家者言”与《儒家言》是什么关系呢?《儒家言》是成书,我们是否可以说“儒家者言”是《儒家言》中的一部分呢?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另有《百家》,归入“小说家”。这大概是刘向所言“别集以为《百家》”的《百家》。由此推知,《说苑》是在《说苑杂事》的基础上经刘向整理而成的一部书,既含原有内容,也含刘向“新造”内容。

清人谭献说刘向“以著述当谏书”,这是强调《说苑》的政治功能。从全书二十卷卷目可以看出,刘向编撰本书目的是弘扬儒家文化,巩固刘氏政权。二十卷卷目是:君道、臣术、建本、立节、贵德、复恩、政理、尊贤、正谏、敬慎、善说、奉使、权谋、至公、指武、丛谈、杂言、辨物、修文、反质,即刘向在《说苑叙录》所言“以类相从,一一条别篇目”。“篇目”即卷目,体现每一卷的主题。这些主题涵盖了忠君爱臣、敬天保民、尊贤斥佞、知恩图报、奖功罚罪、加强修养、重视治术、不辱使命、修文尚乐、戒奢倡简等等,涉及治国理政,提到的历史人物多达 670 余人;以儒家思想为主体,兼顾道、墨、法

家思想。这样一个架构,实际上是一个治国大纲,既是对已有文化典籍体例架构的继承,又为后世编撰此类著作发凡起例。清代孙星衍编撰《孔子集语》即“略仿《说苑》体裁理而董之”。

今天来看,《说苑》不仅仅是一部谏书,其“文化窗”的特点非常突出。该书涉及众多古籍,从中可以窥见先秦典籍文化胜景。《说苑》与几十种古籍有互见关系,这些古籍绝大部分属于先秦重要文献,有的已经散佚。如果按数量排序,前十二部古籍是《孔子家语》《诗经》《韩诗外传》《史记》《淮南子》《吕氏春秋》《韩非子》《左传》《晏子春秋》《荀子》《礼记》《战国策》。

《说苑》反映了《诗经》在当时生活中普遍使用的情况,印证了孔子“不学诗无以言”的观点。徐建委在《说苑研究——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积累与学术为中心》一书中指出:“除了《毛诗》《韩诗外传》之外,刘向《说苑》《新序》《列女传》三部著作几乎是西汉《诗经》学研究最重要的文献了。其中,《说苑》有近百章在文中或文后处引用了《诗经》。”在《说苑·奉使》“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”一章中,刘向四次引用《诗经》,分别是《诗经·秦风·晨风》《诗经·王风·黍离》《诗经·齐风·东方未名》《诗经·大雅·卷阿》。文中的人物分别引用《诗经》中的句子,含蓄而生动地表达了思想感情,如同谜语,妙趣横生。这说明,《诗经》中的句子在当时贵族生活中得到普遍使用。

《说苑》在文章学上的意义也很重要。许多学者注意到了“说”这种文体的特点,拿它与《韩非子》中《说林》《储说》做比较研究,比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就提到了该书。杨义在《中国古代小说史论》中指出:“在叙事完整性和曲折性上,《说苑》不少部分不让

于先秦诸子,而且繁于六朝‘世说体’^①。”笔者认为,《说苑》之“说”体现了比较成熟的文体特点,直接影响了后世“说”体文章。刘向继承前人之“说”,又有所发展。他在每一段故事开头交代背景,制造悬念,创设情境,然后引出故事内容,体现叙述意图。与这种叙述方式相配合的,就是虚构手法的使用。如果是议论,就在开头先设置一个“靶子”,然后引出观点,这比直接说教显得自然。这种“说”体,具有很大的灵活性,或解说,或叙述,或抒情,或议论,一切都为“宗旨”服务。比如《说苑·复恩》“晋赵盾举韩厥”章,叙述赵氏孤儿的故事。该故事家喻户晓,后世戏曲舞台久演不衰,程婴、公孙杵臼已是广受人们景仰的义士。有趣的是,刘向在《说苑》和《新序》中都选用了这个故事,但由于侧重点不同,对故事材料的处理也不同,从而体现了刘向文章学的观念。在《新序·节士》中,刘向表现的重点是程婴、公孙杵臼的侠肝义胆,使他俩成为核心人物;而在《说苑·复恩》中,刘向表现的重点是韩厥知恩图报的品质,对程婴、公孙杵臼救孤的过程只用“朔客程婴持亡匿山中”一句带过,对程婴自杀的情节则全部省去,让韩厥成为贯穿整个故事的中心人物。由于《说苑》的资料是广采群书,就必然有一个对原材料的取舍和加工使用的问题。总起来看,刘向对原材料采取了引用、改造、整合、新写的方法^②。

《说苑》的文献价值向来为人所重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说苑》

① 《杨义文存》第六卷第145页,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。

② 邢培顺《刘向〈新序〉〈说苑〉〈列女传〉材料来源及加工取舍方式探索》,《滨州师专学报》2004年3月。

载：“然古籍散佚多赖此以存，如《汉志》《河间献王》八篇，《隋志》已不著录，而此书所载四条，尚足见其议论醇正，不愧儒宗，其他亦多可采择。”屈守元在为向宗鲁《说苑校证》写的《序言》中评价说，《说苑》取材十分广泛，上自周秦诸子，下及汉人杂著，其中一部分早已散佚，幸赖《说苑》保留了一点遗文琐语。比如《说苑·君道》有“晋平公问于师旷”章，全文如下：

晋平公问于师旷曰：“人君之道如何？”对曰：“人君之道，清静无为，务在博爱，趋在任贤；广开耳目，以察万方；不固溺于流俗，不拘系于左右；廓然远见，踔然独立；屡省考绩，以临臣下。此人君之操也。”平公曰：“善！”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小说家”有《师旷》六篇，但其书已佚，本章内容可能出自《师旷》一书。刘向编撰此书，广采群书，遍引百家，查有实据的文献资料达46种，占总数的90%，还有10%出处不详。这些古籍，今或存或亡，从《说苑》中可以看到其中部分佚文。清人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就充分利用了《说苑》的辑佚价值。仅以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“诸子略·儒家”为例，马氏就辑出《漆雕子》《宓子》《景子》《魏文侯书》《李克书》《宁越》《鲁连子》《河间献王书》的部分佚文。

再如《说苑·辨物》第十三章：

度量权衡以黍生之，为一分，十分为一寸，十寸为一尺，十尺为一丈。十六黍为一豆，六豆为一铢，二十四铢重一两，十六两为一斤，三十斤为一钧，四钧重一石。千二百黍为一龠，十龠为一合，十合为一升，十升为一斗，十斗为一石。